

西南联大优良传统激励我们前进！

杨 绍 鸿

在我心灵深处，回旋着一曲感人肺腑的歌曲：“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是四十多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经常听到的西南联大的校歌。它概述了联大产生的时代背景，抒发了联大师生热爱祖国的壮志豪情，境界高，胸怀远，联大历尽千辛万苦，为国家培育人才，意志坚，决心大，充满乐观必胜的民族精神。这首歌集中反映时代风貌，具有一定历史意义。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它的优良传统、校风是“热爱祖国，孜孜好学”的“艰苦奋斗”精神，校歌对此作了高度概括。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原在故都，物质条件比较优越，但日寇入侵，使师生流离失所，艰苦备尝，进行“万里长征，”不愿做奴隶，为的是救亡。据当年经济学家杨西孟教授调查了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的生活指数，大学教授的薪津数字和薪津实值，如果以三七年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是三百五十元的话，那么，到一九四三年，由于物价上涨，大学教授的工资只等于战前的八元，等于削减了原来

待遇的百分之九十八。由于生活所迫，例如闻一多先生不得不到昆华中学兼一个专任教员，以便每月可以得到一公石平价米，还要挂牌刻图章，添补生活用度。闻先生是诗人，古典文学专家，富有民族气节，他立下心愿，抗战一天不胜利，他便一天不剃胡子，从而成为有名的“美髯公”，与李公朴媲美，看上去是位老教授，实际上他才四十七岁。抗战胜利，闻先生才剃掉蓄了八年的胡须，一时传为佳话。可惜两位举世景仰的爱国志士，国之瑰宝，竟为反动派杀害。但他们的音容节操，才华思想的高大形象，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联大同学热爱祖国、孜孜好学、艰苦奋斗的形象，也给昆明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住茅屋，居陋室，穿蓝布大褂，吃烧饼，半工半读，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这些办学的历史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西南联大的另一个优良传统是“学术自由”，“民主作风”，追求真理的精神很突出。北大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素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著称。清华大学是我国工程师的摇篮，求实科学精神为世人所称道。南开从严求实，活泼创新，闻名于世。西南联大校风兼有三校之长，而人才荟萃，教授名流云集景从，为全国青年所向往。联大师生不仅埋头钻研学术，而且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的变幻；不仅追求自己美好的未来，而且更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安危。联大学术空气自由，百家争鸣，政治空气浓厚，“民主墙”壁报耀眼，是供人呼吸新鲜空气获得营养的“窗口”。联大大草坪的民主集会，经常吸引成千上万要求进步的青年和市民，学习天下大事的课堂。

西南联大的校风，在昆明有广泛的影响，对云南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那时昆明四所大学之间，教师有交流，云大、中法和许多中学就有联大的教师去兼课；有些中学就是联大学生创办的。联大师范学院为云南培养了一大批师资，提高了云南教育质量。

解放前的昆华师范，是云南历史悠久的第一所省立师范学校，是云南培养中小学教师的摇篮。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组成部分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返，昆华师范曾一度继承和发扬联大的优良传统，把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我作为一个联大和昆师的校友，对此，感受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四六年初至一九四八年秋，西南联大教授倪中方先生出任昆师校长。他是云南知名的一位学者，心理学、哲学博士，治学严谨，为人敦厚。他聘请一大批西南联大师生，联大云南同学会的不少同学都到昆师任教，进步教师较多，有些还是地下党同志。因此，西南联大的优良校风，对昆师有特别良好的影响。学术空气浓厚，民主自由校风并有发展。倪校长鼓励同学勤学勤业，对各班学业成绩名列前三名的，给予精神奖励，参加荣誉学会活动，带领参观纺纱厂，接触社会，增长见识。这是办学上的一种创举，因而昆师培养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学生。

当年的昆师，图书馆里进步书刊较多，学生看书的也多。我当时是图书馆主任，便和当时的进步教师成立每周读书会，参加的学生有一二百人之多，学校训导主任王岫（地下党员）则大力支持以开展活动，我们还邀请十多位教师作为该书会的辅导教师。有一段时期，我们每周六都举行学术晚会或时事座谈会，介绍新方式谈论国家大事，我有一次还专题介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给同学阅读。有时，我们还邀请住在昆师的楚

图南教授参加我们的活动。晚会上，组织艺术科的师生表演文艺节目，内容丰富多采，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寓思想教育于生动活泼的活动之中，既教书，又育人。昆师民主自由的校风，一度较为活跃，对学生政治思想有好影响。昆师不少师生，后来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解放后，许多联大和昆师校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才。这是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激励我们前进！这是联大在昆明播下的民主自由之种，在云南开放的绚丽之花和结下的丰硕之果。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

西南联大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工作

杨 光 社

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自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在昆明正式上课，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胜利结束，历时整整八年。八年中，“尽筋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西南联大校歌）西南联大人才荟萃，学者云集，成绩卓著，闻名中外，在我国教育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著名教授王力的《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是很好的真实写照：“芦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事业，结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长篇。”（癸亥立秋前三日录缅怀西南联合大学附《春城晚报》留念）①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一九三八年二月，学校西迁昆明，四月二日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设理、工学院，并增设师范学院。在蒙自设文、法商学院（一学期后迁来昆明）。一九四〇年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有一年级和先修班，第二年亦迁来昆明。

全校共有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是当时全国规模较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教师三百余人，

以一九四二年为例：教师 358 人，其中，文学院 77 人，理学院 106 人，法商学院 42 人，工学院 73 人，师范学院 36 人，其他 24 人，教师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其中，教授、副教授 170 余人，占教师总数约二分之一。全校职工 400 余人。在校学生一般约 3000 人，一九三九年 3019 人；一九四二年 2778 人，其中，男生 2451 人，女生 327 人，文学院 412 人，理学院 322 人，法商学院 891 人，师范学院 276 人，工学院 724 人，先修班 93 人，研究生 62 人。八年来，历届正式毕业学生 2581 人（原来三校学生未列入），参加空军、青年军 300 余人，应征译员 400 余人。由于时局动乱，颠沛流离，中途休、退学者较多；加之学校要求严格，淘汰率较高，特别是一年级。所以，总计在联大受过教育的约有 8000 余人，但真正读到毕业的还不到一半。②

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举世闻名，有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其中，精简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独具特色的管理工作，是重要因素之一。笔者 1942——46 年在联大中国文学系学习，身历其境，亲见亲闻，有比较深切的感受。

一、严密的组织机构

西南联大的领导管理体制和行政组织系统，是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处、院、系分工负责制。现分述如下：

1、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全面工作，管理一切校务。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分工负责总务）、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教务）、南开校长张伯苓（负责建筑设备）三人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设主席一人，由三校校长按年轮流担任。但因蒋梦麟、张伯苓

在外地另有其他任务，经常不在学校，一直是梅贻琦担任主席。张伯苓委托蒋梦麟参与学校大政。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八年合作的基础。”③ 常委会定期召开会议（一般都开扩大会），请各处、院长参加，讨论决定重大事宜。常委会的决定，由主席负责执行。

2、常委会领导下的行政机构——处、组、馆、室

常委会下设秘书、教务、总务、训导四个处。除秘书处外，其他三个处，下面都设有几个组。

秘书处：中文系教授杨振声为秘书长。

教务处：先后担任教务长的是潘光旦、樊际昌、周炳琳、扬石先等教授。下设注册组（主任先后是潘光旦、朱荫章）、图书馆（主任先后是严文郁、董明道）和出版组。

总务处：先后担任总务长的是周炳琳、沈履、郑天挺等教授。下设文书组（主任先后是周久庵、朱洪）、事务组（主任先后是毕正宣、刘本钊）、出纳组（主任先后是王伯宣、王家祥）、会计组（主任先后是沈叔文、刘佐时、路祖焄、沈展拔）。

训导处：公民训育系教授查良钊为训导长。下设体育卫生组（主任马约翰）、军事管理组（主任毛鸿）、和校医室（主任医师徐行敏、陈玉善、郑信坚）。

建筑设备：主任黄钰生。

3、常委会领导下的教学机构——院、系、科、班

全校有五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各学院院长和各系系主任，均为著名教授担任，专修科主任，除个别科外，亦为教授担任，甚至先修班的主任，也是教授担任。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都是兼职不兼薪，他们的主要工作

是搞教学与科研，并把三种工作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具体情况是：

① 文字院：院长冯友兰。下设四个系：中国文学系，通常有教师十五、六人，系主任先后为朱自清、罗常培、杨振声、罗庸等教授。课程分为文学和语言文字两组，课程编制与战前相比，“古气”更重一些，比较注重中国文学史和历代诗、文等古典文学的研究。外国语文学系，教师约20人左右，系主任先后为叶公超、陈福田。课程编制与战前相比，必修课减少，选修课增多，文学史课程减少，文学家课程增多。历史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刘崇铨、雷海宗。课程编制与战前相比，断代史、国别史更为齐全。哲学心理学系，分哲学组和心理组，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冯文潜、汤用彤。课程编制，增设了几门教育心理方面的课程。

② 理学院：院长先后为吴有训、叶企孙。下设五个系：算学系，有教师十二、三人，系主任先后为江泽涵、杨武之、赵仿熊。课程编制，选修课较战前增多，内容也比较新，多由新归国的青年教授担任。物理学系，有教师十四、五人，师资力量充实，保证了较高的讲课水平。系主任先后为饶毓泰、郑华炽。化学系，有教师20人左右，系主任先后为杨石先、黄子卿。课程编制，有大量选修课，增加了一些实用性的课程。生物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为李继侗。课程编制，除共同必修课外，其余学分可自由选择。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为孙云涛。课程编制，增开了一些新课程。

③ 法商学院：院长先后为方显廷、陈序经、周炳琳。课程编制，各系均与战前基本相同。下设五个系：政治学系，系主任为张奚若；法律学系，系主任先后为代修瓚、燕树棠；经

济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陈点、陈岱孙；商学系，系主任先后为丁信、陈岱孙、徐毓枬；社会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陈达、潘光旦。

④ 工学院：院长施嘉炆。这个学院，基本上是战前清华工学院的继续（北大无工学院，南开只有化工系）。课程编制，与战前相较，仅有局部的变化。因战时仪器设备和经费困难，增加的课程，多属于理论与设计方面的。鉴于军事上的需要，增设了航空工程学系和电讯专修科。教师通常有30人左右。共有五个系、一个专修科：土木工程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施嘉炆、蔡云荫、陶葆楷，机械工程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庄前鼎、李辑祥。课程编制，增加了一些技术性的新课程。电机工程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赵友民、倪俊、任之恭、章名涛。课程编制，分电力组与电机组两个方面，与战前相同，教学水平有所提高。化学工程学系，是原属南开大学的一个系，系主任先后为陈克忠、苏国桢、谢明山、张子丹。航空工程学系，是最年轻的一个系，系主任先后为庄前鼎、冯桂连、王德荣。课程编制，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编制，共开出21门课程。电讯专修科，科主任先后为赵友民、张友熙、周荫阿。

⑤ 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下设七个系、两个专修科（师院本科五年毕业，专科三年毕业，其他院系均为四年制）：教育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邱椿、陈雪屏；公民训育系，系主任先后为罗廷光、田培林、陈雪屏、陈友松；国文学系，系主任先后为朱自清、罗常培、杨振声、罗庸；史地学系，系主任先后为刘崇铨、雷海宗、蔡维藩；英语学系，系主任先后为叶公超、陈福田、李保荣；数学系，系主任先后为江泽涵、

杨武之、赵仿熊；理化学系，系主任先后为杨石先、许桢阳；师范专修科，科主任为倪中方，下设两个科：文史地专修科，科主任为张清常；数理化专修科，科主任为许桢阳。另外还有两个短期训练班：云南省中等学校师资进修班；云南省中学理化实验讲习班。

⑥ 先修班：主任李继侗。

4、常委领导下的权力机构——校务会议

校务会议由常委、院、处长及与之相等的教授代表组成（代表12人、后补代表数人）。教授代表不是固定的，每年选一次，八年来从未间断过。以1938年为例，选出代表：朱自清、陈点、叶企荪、陈福田、钱端升、张奚若、刘崇铨、叶公超、杨石先、庄前鼎、查良钊等教授。后补代表：潘光旦、汤用彤、罗常培、曾昭抡、李辑祥、邱椿。1945年9月2日，选出第八届代表。学校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须经校务会议讨论，作出决定。校务会议是权力机构，它通过的决议，一般都必须执行。有的决议，有不同意见，如果难以执行，也不能由少数人任意改变，要由校务会议再讨论，进行复议。如校务会议决定：1941年度起，不继续在四川叙永设分校。后来蒋介石、陈立夫（当时教育部长）传来旨意，要继续设叙永分校。这两种决定，完全相反，究竟何去何从？常委会又把这个问题交校务会议讨论。复议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陈立夫的目的是先留叙永分校以分散联大力量；然后逐步把联大迁往四川，以便就近控制。所以仍然决定：撤销叙永分校，只留下一个先修班。其实，留下先修班，也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过了不久，先修班也迁来昆明，叙永分校全部结束。

5、常委会领导下的参谋机构——教授会

教授会由全校教授、副教授组成。其任务主要是起审议、咨询、参谋和辅助作用，有时在实际上也起决定全局的作用。虽然只是教授、副教授参加，但他们有真才实学，又与广大师生朝夕相处，了解情况，所以意见中肯，切中时弊。会议不定期，开会也不多，但遇到重大问题，则开得比较多。如“一二、一”运动期间，1945年11月29日至12月25日，就开了9次。主要讨论如何申张正义，支持民主运动，与反动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对地方军政当局的《抗议书》。还组织了“教授会法律委员会”，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6、常委会领导下的临时性机构——各种专门委员会

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的目的，有组织广大教师特别是教授来共同管理学校事务。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是：每个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委员人数各委员会不同，有的不到十人，有的十几人。委员会人选，由常委会推定或聘请。这种会议的性质，是临时性的机构，比较灵活，根据工作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就宣告结束。八年中共成立过74个专门委员会：课程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出版设计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招考委员会，新生课业指导委员会，奖学金委员会，校舍建筑设计委员会，财务财政设计委员会，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实习工厂稽核委员会，战区学生救济及苦寒学生贷金委员会，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国防技术指导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防空委员会，迁校委员会，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等等，不再一一列举。以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为例：1938年10月3日，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选出主席和委员，并进行工作。主席：冯友兰，委员：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1938年11月26日，决

定以“刚毅坚卓”为联大校训。

7、科研机构——三校研究所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后，各研究所仍各自独立，分校管理。

三校共有五个研究所：

① 文科研究所。下设十个学部和部分：中国文学部（语言文字组、文学组，均属清华）；外国文学部（清华）；哲学部（清华）；历史学部（清华）；史学部分（北大）；哲学部分（北大）；语学部分（北大）；中国文学部分（北大）；考古部分（北大）；人类学部分（北大）。

② 理科研究所。下设七个学部和若干个组：算学部（北大、清华、南开）；物理学部（清华、北大）；化学部（北大、清华、南开）；生物学部（动物学组属北大、清华，植物学组属清华、北大，昆虫学组属清华，生物学组属清华、北大）；地学部（地质学组属清华，地理学组属清华，气象学组属清华）；地质学部（北大）；心理学部（清华）。

③ 法科研究所。下设四个学部和若干个组：法律学部（分三个组：中国法律史及法律思想史组、国内司法调查组、犯罪学组，均属北大）；政治学部（国际法组属清华，行政组属北大，国际关系学组属北大）；经济学部（经济理论组属清华、北大，国际经济组属清华，财政与金融组属北大）；社会学部（清华）。

④ 商科研究所。下设经济部，共有五个组：经济理论组、经济史组、农业经济组、工业经济组、统计学组。均属南开大学。

⑤ 工科研究所。下设三个学部和若干组：土木工程学部

(下设水力工程组、结构工程组)、机械及航空工程学部、电机工程学部(下设电力工程组、电讯工程组)。均属清华大学。④

研究所所长,一般由原校学院院长担任。学部主任由各学系系主任担任。

二、独特的管理工作

西南联大的管理工作,是独具特色的。西南联合大学,联合了些什么?联大八年,是三校优良传统互相融合并取其所长、避其所短的八年。其共同点是“民主办校、重视科研、学术研究自由”。⑤联大的整个管理工作,我不能全面概述,只能就自己的亲见亲闻、亲身体会,写几点具体感受。我的感受可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围绕中心,谨严认真;团结合作,民主精神;发扬传统,开拓创新;筚路蓝缕,不辞艰辛。”

1、围绕中心,谨严认真

西南联大既以教学为中心,又以科研为中心。教学与科研并重,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学校一切工作都把教学与科研融为一体,并围绕这个中心,积极为它服务。

常委会主席梅贻琦系1909年(宣统元年)清华第一届留美公费生,工科博士。回国后,多年历任清华大学校长,经验丰富,治学严谨,富有远大理想,一向重视教学与科研的领导和管理。他对师生员工,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尽量提供图书、仪器、设备和有关条件。

各院系领导人和广大教师都在教学第一线,充分备课,认真教学。并以科研成果,丰富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学术空气浓厚,既研究传统基础科目,也研究新的理论科

技，并能面向社会，调查研究，在教学中检验充实。

在广大教师中，教学与科研并重，做出显著成绩的，数不胜数。仅就我所熟知的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举世闻名的民主战士、著名教授闻一多，在教学上，他开诗经、楚辞、唐诗、庄子等课程；在科研方面，他研究的著作有《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唐诗杂论》、《诗选与校笺》等等。他的科研考索赅博，立说新颖，与教学紧密结合，有很多独到见解，深受同学欢迎。著名教授朱自清，开中国文学史、历代诗选等课程；研究著作有《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古诗十九首释》、《中国文学史纲要》等。教学、科研结合，质量很高。他讲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他说：“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要“做尖兵的份儿”。⑥他既重视基础知识的讲授，又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定期要求学生交读书报告，仔细批改。除期中、期末考试外，还有多次小测验。考试题目，除基础知识方面的以外，还有大量的让学生独立思考、发表创见的内容，对同学的启发教育是很大的。

学校的规章制度，比较健全，并且能严格执行。各级领导人一般都能以身作则，作出榜样。教学、科研、行政事务工作，紧密结合，浑然一体，有条不紊。聘请教师、招收新生、期中期末考试，评定成绩、升级留级、毕业、开除等等，都能做到秉公正直，一视同仁，不讲情面。任何人包括校常委会主席、各处、院、系领导人和社会上达官显贵的子女，都不例外，所以保证了学生的质量。

师资的聘任提升，由各系推荐，常委会讨论决定，层层负责，不是个人说了算。招生严格，要求较高，不易录取，因是

名牌大学，学生慕名报考，人数较多，挑选余地大，录取质量高。学校不定招生指标，按报考志愿合格人数，决定招生人数，所以有的系只有一个或几个学生。大学一年级，要求特严，共同必修课，多是院系负责人或名教授担任，如许宝騄的微积分，杨石先的普通化学，李继侗的普通生物学，郑华炽的普通物理，雷海宗、吴晗的中国通史等等，都很不容易考及格。各院系都注重本学科的基础，本院系的大一必修课，必须在70分以上，才能进入本学系，所以有的人被迫转系。还注意课程的连续性，上年的学科不及格，不得选下一年的有关学科，如大一英文不及格，不能学大二英文。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者留级，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者开除，毕业论文不及格不得毕业，必修课不及格必须重学，直到及格为止。

教授对讲师、助教，一向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如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罗常培，对中文系一助教把“病入膏肓”读成“病入膏盲”，非常生气；严肃批评，又经过考核，那个助教确实不称职，即予以解聘。反过来，教授“反求诸己”，对自己要求更严，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以高质量的教学，教育感染学生。通过考试、作业、论文，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为留助教、招收研究生作好准备。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说：“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所念的课，一般老师都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的研究院时间，我学了很多东西”。

“在联大我有十分扎实的根基”。⑦

学校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对职工要求也很严格。一般职工都能遵守纪律制度，按时上下班，克尽职守，完成各自的任务，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有一天上午九时，常委会主席梅贻

琦发现有一个办事员，预行警报就离开工作岗位，马上召集职员开会，“严予警诫”。

2、团结合作，民主精神

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接受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囊括大典，网罗众家”^⑧、“兼容并包”、清华大学“治学谨严”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允公允能”的思想，并能结合联大的实际，运用裕如，进一步结成“通家之好”。他勤勤恳恳、公正廉明，以诚待人，博得广大师生的信任，有很高的威望。沈刚如说：“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梅校长主持其间，以集思广益，兼容并包之精神，内创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树民主堡垒之称号，卓有成就地完成战时教学之使命。”^⑨全校师生之间、上下左右之间，相处融洽，团结一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指出：“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段记载言简意赅，非常中肯。

西南联大确实是精诚团结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办好联大，培养人才，团结奋斗，终于取得显著效果。著名教授郑天挺说：“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曾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则始终团结。”^⑩本来教师有不同的思想作风和学术观点，师生有不同的政治见解，意见分歧乃至互相争论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现象。特别是在民主运动中，政治态度、思想观点上的斗争，尤为激烈。但大家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必须共渡时艰，越是困难，越要紧密团结，才能把学校办好。大家都有热爱联大的思想感情，有

共同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什么门户之见、师承关系，都不那么强调了。所以，大家都能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形势紧急时期，更是不分彼此，风雨同舟，合衷共济，完成事业。敌机疯狂轰炸昆明的时期，为了保障师生工作和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少教师对待工作，不分份内份外，抽出时间和学校职工一起，为教师和家属找安全的疏散住地，同时疏散图书、仪器和设备。还远到外县去买粮、运粮，使全校不至于断绝粮食，影响工作和生活。

在管理工作上，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管理。

西南联大，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学术上是民主的，而且在管理工作上，也显示了民主精神，实行民主办校。梅贻琦曾经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吾从众”。他的作风，十分民主，很尊重大师们的意见，尊重各级领导人、各专门委员会和教授会成员们的意见。各院、处长列席常委会，加强了领导力量。全校大事，召集校务会议和教授会讨论，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讨论中，各抒己见，有时争论很激烈。梅贻琦能“从容审度其间，”作出“各如其意”的正确决策，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

常委会对各处、院、系的领导，也是民主的，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各处、院、系领导人，可以放开手脚，大胆负责地干。但他们不是个人专断，每遇重大问题，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让大家充分讨论，虚心听取意见，然后作出决定。因为这样，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广大教师不仅出主意，想办法，献计献策，而且实际努力，埋头苦干，做好工作。

各级机构领导人，都比较精干，只设一个正职，从来没有副职，也不要什么秘书。这些领导人，凡是他份内的事，都是